

## 1990年代俄国的历史文学：对苏联的多种否定性叙述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提 要:** 后苏联时代到来的过程, 伴随着对苏联的批判、否定。这种潮流既是文学的产物, 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 由此出现了大量书写苏联历史的文学。这种文学, 包括回忆录、人物传记、苏联历史题材的小说等, 成为俄国文学史上少见的历史文学。历史文学多方否定性叙述苏联, 作者多为苏联的亲历者。这个过程持续到 1990 年代末, 后被对苏联的怀旧所替代。

**关键词:** 后苏联; 历史文学; 否定苏联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对历史的文学性追忆, 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叙事传统: 流亡期间的赫尔岑 (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 1812-1870) 所写的鸿篇巨制《往事与随想》, 给读者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十二月党人到 1860 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 更有作为思想家的作者参与这段历史的现场感和独特理解; 卢纳察尔斯基主编的《文学百科全书》(1934), 甚至收录有“回忆录文学”条目。不过, 后苏联对历史的追忆还是不同于过往的回忆录, 按批评家巴辛斯基《回忆录? 一种复杂而崇高的文体》(《文学问题》1999 年第 1 期) 的说法, 是全体俄国人都遇到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我们无处躲藏”, 对历史的追忆成为栖身之所和理解现在问题的通道。所以, 早在 1993 年批评家涅姆泽尔就敏锐地指出, 后苏联出现了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的史学家、作家和政客等共同关注历史的现象, 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神化的)被证明是一个棱镜, 经由它可以看见不确定的现在和模糊的未来, 俄国人尤其感兴趣对俄国历史上转折点的讨论, 并带来两种不同反应, 或者抱怨过去的一切是一错再误, 或者世故地认为不可能是别的。(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 1993: 226) 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 1986 年放映艾布拉德泽导演的幻想性历史题材《悔恨》(反斯大林主题)、1988 年出版地下作家鲍里斯·亚姆波里斯基的《莫斯科大街》(《旗》杂志 1988 年第 2-3 期合刊), 以及谢尔曼·阿拉诺维奇执导《我当斯大林贴身警卫》(1989)、《我担任斯大林的机要秘书》(1990) 和《人民的大型音乐会》(1991) 等, 促成了激烈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其他领导人、拒斥苏联体制和苏联的历史文学, 在俄国迅速畅销起来。并且, 阅读历史文学不是临时性现象、部分读者兴趣所为, 而是一种社会潮流, 按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马雅可夫斯基城市图书馆的数据, “最近十年来, 读者对阅读历史文学远甚于此前的苏联时期读者”; (Н. Дадаль и З. Рудая 1996: 220) 2001 年阅读调查显示, 对 21 世纪俄国读者而言, 历史仍然是流行的科目, 虽然这种趋势正如世界上很多国家那样——影视文献片日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群。(David Cannadine 2002: 11) 而且, 这种普遍流行历史文学的情景, 只在表面上似乎是延续苏联时代对历史小说热衷的余热, 符合重新发现历史上个人复杂性的叙述, 也契合俄国文学和历史关系本来就很模糊的情形(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托尔斯泰的《彼得

大帝》和阿克肖诺夫的《莫斯科传奇》等经典作品分别是对不同历史的再叙述，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邦达列夫等则热衷于把当代现实置入不同时段的历史语境下理解；但是，实际上和苏联有很大不同：苏共意识形态掩盖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公开性就是要寻求历史真相，这种政治行为却因文学在苏联的巨大能量，导致价值观和审美观念发生变化，即揭示历史性真理，走向重建历史。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文学潮流并非作家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后苏联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动力、建构的重要方式：后苏联诞生于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过程中；后苏联诸多变化，在很多方面是因对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解释方式和立场有了变动。相应的，反复叙述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成为后苏联文学的重要内容；后苏联文学的变化过程，许多方面就是通过叙述苏联的立场或方式发生变化所标示的，随时间延伸，“苏联人”、“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等不仅作为专门的历史概念，而且成为文学的内容。进而，成就了这样的具体文学事实：在文学产业中，仅次于大众文学规模的是历史文学（大众文学中也有不少产品是通俗化叙述历史的），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包括回忆录、历史演绎、历史小说等不同文体。

问题是，苏联时代就流行历史类文学，并且有不少也是批判性的，何以区分苏联和后苏联的历史文学？“历史”在俄国本是不断被建构的话语：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和以后的改革历程，就着眼于当下的功利主义需要重建俄国历史；赫鲁晓夫以来不断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以降就极力否定“斯大林体制”，原本是简单明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的举动，却变成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历史学行动。这些貌似有历史学依据的政治行为，当然不可能解决苏联问题，甚至成了促成苏联解体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后苏联已经没有这种体制上的必要性，苏联文化连同苏联权力已变成一种独特的事实，变成了复杂而沉重的历史遗产，关于苏联遗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诸如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的作用、列宁的历史贡献和列宁墓迁移、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体制、赫鲁晓夫改革和勃列日涅夫停滞等论争，此起彼伏地穿行于后苏联的社会思想变迁过程。由是，这些本来已经逝去的历史，却激活了社会思潮，也激动着不同的文学生产者 and 消费者，成就了不同于苏联时期历史题材的历史文学景观，即再次讨论斯大林、列宁和苏联问题，虽然未必是再发现历史真相、使历史发展正常化，却希望在历史的再叙述中寻求历史的安慰。

在历史文学中，规模最大、经常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对统治苏俄 24 年（1929-1953）之久的斯大林，以及被涂抹了浓厚的斯大林色彩的这期间和此后的苏俄体制和文化。1920 年代末以来的苏俄，无论历史如何变革，包括文学艺术在内，斯大林总是挥之不去的形象，甚至是 1930 年代后期以来的苏俄文学最热衷描写的人物，无论是正面塑造，还是反面讽刺批评，持续的斯大林热甚至刺激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坛。后苏联历史文学对斯大林的描写，实际上是关于斯大林问题讨论的延伸：冷战末期以来，由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岑的《古拉格群岛》、西尼亚夫斯基和萨哈洛夫等侨民知识分子在国外的披露，西方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等量齐观；这种表述，因回归文学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合法进入，在后苏联俄国也甚嚣尘上；在两次大选中为了战胜对手俄共，叶利钦多次在不同电视频道公开声称，斯大林更坏于希特勒，“因为斯大林迫害的是自己的国民，希特勒要消灭和征服的是外国人”（实际上希特勒也迫害德国犹太人）；同样，《俄罗斯思想》报主编卢兰很感慨，死于古拉格流放地的俄国精英远多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时代变化使德国人和世界人没有改变对希特勒和纳粹的看法——“纳粹主义毫无疑问是要被审判的，但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则迄今为止成为要深入反思的对象。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是集恶中之恶，勿须在另一种语境下再试验纳粹主义。在俄国，斯大林领导的反纳粹主义胜利被解释成伟大的爱国主义”。

在这种历史文学中，首先要提及的是，曾亲历这场战争（从 1942 年开始以普通士兵身份参战，直到战事结束）的老一代作家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Астафьев, 1924-2001）创作的两卷本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新世界》1992 年第 10-12 期、1994 年第 10-12 期）：

第一部《鬼坑》题辞《新约·保罗达加拉太人书》（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从第21步兵团的一个士兵的视角生动描写卫国战争中的许多疯狂、恐怖景象，和苏联红军中不公正的死刑和威吓（包括军官欺负战士、老兵侮辱新兵，军营管教下层官兵如同监狱对待犯人，如一对孪生兄弟违纪——擅自离队就遭处决）；第二部《登陆场》用日记叙述红军解放基辅的一次战役，指挥混乱、官兵贪生怕死、政工干部虚伪并专横，尤其是讽刺性地描写斯大林1942年11月7日红场的讲话——鼓励将士英勇抗战，但鼓励的对象是他怀疑的人民并虚假通报战争消息（相应的，还对常年被强制性滞留苏联的德国士兵深表同情，赞赏性描写德国官兵作战勇敢、有序）。以写农村题材《鱼王》（1976）而著称的阿斯塔菲耶夫，一反常态地写起反对苏联的军事历史小说，引起争论；但四年后《快乐的战士》（《新世界》1998年第5-6期）仍继续苏联军事历史题材小说：描写苏联人民同仇敌忾抗击纳粹侵略者是一个制造出来的神话，因为一开始苏联的许多人是欢迎德国人进入苏联的，并视之为是对斯大林暴政的解放，一些普通士兵成功抗击了纳粹，却在很快取得胜利的祖国遭遇忽视和比纳粹迫害更严重的羞辱等。

阿斯塔菲耶夫这样描写，却没有妨碍他两次获得俄联邦国家奖（1996年和2003年去世后追加）：因为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殃及到苏联津津乐道又引以自豪的卫国战争，实际上既是延续文学史——1950年的解冻思潮开启描写这场战争残酷性的先河，许多作家由此发生转变，如犹太族裔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1905-1964），曾以《人民是不朽的》（1942）和《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而赢得著名作家的声誉，解冻思潮之后，耗时八年创作成功的70万字巨著《生存与命运》，严重置疑这场战争的伟大性——以战壕真实派笔触披露苏军在战争中许多令人恐怖的事件，当时没能发表并殃及作家命运（从此被克格勃盯上）；该作直到1988年才得以出版，这属于讨论苏联问题的正常升级；1990年代大量出现这类作品，更是自然不过的接续。于是，继《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之后，雷巴科夫发表进一步强烈反对斯大林的《灰尘与灰烬》（1994）。在此叙述中，1939年8月23日，在斯大林-希特勒操纵下签署的苏德外长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实际上已对苏联构成严重伤害，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这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是临时的军事撤退，还是有意识的选择；被苏联官方打扮成卫国战争功勋仅次于斯大林的伏罗希洛夫，实际上是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的，他和斯大林等军事领袖对战争进程的延误，是使卫国战争变得艰难起来的最主要原因；除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叙述外，还涉及斯大林的许多个人恶行（许多细节写了斯大林欺诈性对待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要根除托洛茨基和相关人物等，如克格勃在巴黎和墨西哥执行暗杀计划，他和朱可夫之间不可告人的复杂关系等）。

同样，著名的老作家列昂诺夫（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1899-1994）的长篇巨著《金字塔》（1994），放弃苏联时代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獾》、《小偷》、《俄罗斯森林》等现实主义诗学，改用幻想形式，叙述“大战爆发前一年”的苏联，天使德姆科夫来地球探访，作为撒但化身的尼茨基教授设下陷阱，让天使逐渐丧失创造奇迹的本领，无法回到自己的世界，若不是东正教神甫的女儿杜尼娅相助，天使几乎离不开地球。在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等著名文学家影响下的俄国，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魔鬼控制的世界，斯大林甚至试图征募杜姆科夫这位来自另一个星球、地球人视为天使的人物帮助，用其神奇力量帮助他建立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所写的阴郁人物什加列夫所构想的新社会，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从肉体和精神上镇压导致人类不平等的异己分子；由此，斯大林被描写成一个十足的魔鬼，他自认为是比伊凡雷帝更为坚忍不拔的绝对统治者，是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的后裔。叙述者认为这个计划要遭到后代人诅咒的，因而杜姆科夫选择离开地球，因为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战胜当时控制着俄国的邪恶力量。小说把传说中的特异功能大师犹太人梅辛格（曾在二战初期预言希特勒的失败，遭到纳粹的追捕，逃到苏联参加了一个马戏团，巡回表演心灵感应、发布预言被应验）变成了对斯大林相信超能力的讽刺。

与这些已是著名作家转向不同,更有本来就批评斯大林和苏联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作家:索尔仁尼岑的短篇小说《自我》和《在边缘上》(1995)触及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和二战,特别叙述被斯大林打压的朱可夫元帅,还原朱可夫如何在图哈切夫斯基影响下,从一个农民、士兵成长为军事统帅的历程,这样的人无论斯大林的苏联体制对其多么不信任,俄国人都应该指责他。作品因深刻再现了被官方压制的历史,被批评家佐托夫认为其价值远不仅仅是艺术的审美方面,更在于对历史教科书的有价值补充;(Игорь Зотов 1995: 66)一向重视当代小说散文化问题的批评家梅利霍夫认为,索尔仁尼岑这样描写,对俄国人理解历史进程是极其重要的。而这样的论述有其历史根据,索尔仁尼岑 1990 年在达理辞源学词典所提供的古词和谚语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俄罗斯语言扩展词典》,小说就试图通过深入俄国语言深层结构去理解苏联体制问题。归侨文学中最有成就者阿克肖诺夫的《莫斯科传说》(1993-1994)追述出色医生格拉多夫及其家人从 1925 年以来的命运,涉及主人公因为医术高明,被安全部门强行纳入暗杀斯大林潜在对手伏龙芝的事件,这类斯大林因素虽然未突破此前众多不同类型的斯大林形象,即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的专制暴君等,但因经由普通人的命运变化反映出来,斯大林之于苏联的存在变得具体、切实、生动、更为深入,因而深得俄国社会的关注。而侨居德国的弗拉基莫夫(Георгий Владимов, 1931-2003)的《将军及其部队》(《旗》1994 年第 4-5 期、1997 年单行本),把历史和小说相融合,主体部分叙述可布利索夫将军命运的起伏跌宕,如在前线还被斯大林派来的锄奸队监视、不被信任被莫斯科召回、又因战功而被提升等;同时触及朱可夫元帅为了 1945 年 5 月之前占领柏林,不惜牺牲大量将士;涉及被苏联禁止讨论的曾投降德国的弗拉索夫将军,1941 年在苏联红军局势困窘时发动反攻、拯救了莫斯科;当然,也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斯大林形象,包括反复出现的意象和性格,如凶恶的眼神、柔软的棉靴、八字胡、麻子脸,像其他作品那样把他写成易怒并令人讨厌的猫、受伤并被猎人追逐的动物。这样描写斯大林,更有 1990 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暗示这是一个形象上不属于俄罗斯的外族人。

尤其是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以新时代人的眼光重建斯大林和苏联形象。1990 年代以《论 17 世纪恐怖年代的俄国》为副博士学位论文而毕业于沃隆涅什大学的弗拉基米尔·沙洛夫,其《此前与期间》(1993)提前使用了别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1996)与马卡宁《地下人》(1998)后来才使用的手段——把俄国和苏联比喻为精神病院,叙述者阿廖沙作为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这儿人的经验被其记忆所操控,他就这样断言自己是真实历史的叙述者,叙述了法国作家、著名沙龙主人、最受 18-19 世纪之交俄国作家尊敬的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el, 1766-1817),曾和俄国乌托邦思想家尼古拉·费多洛夫(1823-1903)生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斯大林(1878-1953)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做了许多令人恐怖的事情。由此,作品引发了文学如何表达历史的激烈争论,批评界严厉斥责其歪曲和嘲弄俄国历史及其包含这类耸人听闻的乱伦主题。(Ирина Роднянская 1993: 215-217)然而,作家自认为该作很少变动历史,变动的只是斯大林、费多托夫、作曲家斯科里亚宾(1872-1915)等名字,但他们都是可能潜在地破坏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乌托邦人士,无论每个人实际做了什么,皆曾打算参与或倡导乌托邦。(В. Шаров 1996: 175)的确,作品展示了当代人希望重新发现俄国的非理性、哲学、神秘等传统,描写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史辩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理性、逻辑、原因、结果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安纳托里·阿佐利斯基(Анатолий Азольский, 1930-2008)这位苏联海军,在苏联时代称不上是作家(只是在业余发表过无人问津的作品),后苏联因以幻想性手法叙述历史人物的小说《柏林-莫斯科-柏林》(《大陆》1994 年第 79 期)而一举成名。作品叙述一位曾参与 1944 年试图暗杀斯大林事件的人物,多年后匿名在新西兰向听众讲述当年的情形,特别描写了斯大林那令人恐怖的眼睛、不离身的烟斗、军人短上衣和靴子;1997 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笼子》(《新世界》1996 年第 5-6 期),主人公巴里诺夫作为数学家、生物学家,一生中一次次身陷囹圄、多次面对死亡,又一次次侥幸逃脱牢笼,用各种假名和假身份

证逃生于林海或人海，过着悲惨生活，继续从事着深奥的遗传学、染色体的研究工作。叙述中传达出作家以主人公的经验去个性化地理解苏联历史，即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制度使普通人宛如被禁锢在笼子里，并且真实描写了秘密警察行动的细节。与《笼子》相当，瓦列里·伊萨耶夫的文库小说《斯大林的老战友》（1994）立足于克格勃新公布的材料，叙述斯大林表面上相信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波斯迪舍夫（Павел Постышев, 1897-1940）1938年却被逮捕并死于狱中的历史，回避他作为乌克兰领导清除异己和残酷对待农民的历史。至于后苏联最被争议的索罗金，其《蔚蓝色的油脂》（1999）甚至写斯大林和希特勒1954年还活着，他一个叫微斯拉的女儿被希特勒强奸，虽然他曾和希特勒合作过，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同性恋。

可以说，不同方面的文学生产者皆个人化地叙述苏联和斯大林，这种情况还延伸出和列宁的关系：女作家托尔斯泰雅的《情节》（《句法学》1991 №31）叙述若普希金决斗没有死，而是击中了一个叫瓦洛佳·乌里扬诺夫的青年人（列宁的小名），这个人是激进的沙皇爱国主义者，1918年战胜德国后当上了内政部长，长期敌视普希金所讴歌的自由精神，甚至反对诗人所描写的国家和人民；乌里扬诺夫去世之后，德·朱加什维里（斯大林）替代其位置，俄国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改变的。而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与傻瓜一道生活》（1991）着力描写长相如列宁般的沃瓦——一个内涵复杂的红头发的狂人（沃瓦乃弗拉基米尔的小名）。该作英译者雷诺兹认为，沃瓦使俄国神圣傻瓜（юродивый）形象得到了讽刺性表达，颠覆了普希金《鲍里斯·戈东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等人物形象塑造的传统，沃瓦暗中破坏了传统俄国观念——神圣傻瓜被赋予了精神智慧并总是口说真理，在此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炫耀俄国人智慧的嘲弄。（Victor Erofeev 2004: 24）尤其是，别列文《奥蒙拉》（1992）也写到列宁崇拜，苏联人的生活被列宁所侵占，无论多么陈腐或莫名其妙，列宁的话、列宁的形象总是无所不在，以至于不是列宁的话也被假冒是出自列宁之口，如一个中尉引用假托列宁1918年的话“在所有星球和天体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月球”，实际上是讽刺性模拟列宁“在所有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从那时（1918）以后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已发生了多方面变化，但列宁评估：时间已证实其正确的，列宁这些话的火光仍在照耀今天的在日历。的确，月亮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列宁形象发生的变异，类似于侨民艺术家亚历山大·科索拉波夫的“社会主义艺术”反宣传画《可口可乐——它真正的事情》（1980）——无所不在的苏共党旗，变成了商业化的可口可乐广告的底色，也随处可见。米哈伊尔·库拉耶夫的《遇见列宁：来自档案的真实故事》（《新世界》1995年第9期）中，叙述者意外有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手稿，这份手稿不能说出1967年纪念列宁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会见几千工人失败的故事，老布尔什维克试图创造一个宏大的纪念列宁的场面，却被许多因素破坏：这给理解苏共失败试验提供了隐喻，显示列宁不可能重回那个历史瞬间，俄国人不可能回到苏联历史，“现在许多人不再相信列宁，人们开始相信基督并期待着其第二次降临”，叙述者明白复活历史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坦白存在着一块历史幕布，从而质疑何谓真实的历史。

正是在再造斯大林和列宁形象变化基础上，后苏联扩展了重新叙述苏维埃历史的范围，并用戏谑的态度取代之。其中，对十月革命后持续多年的内战，苏联官方史学称之为反对白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临时政府军和孟什维克被描述为凶恶的敌人——红色作家富尔曼诺夫的历史文献小说《恰巴耶夫》（1923）和瓦西里耶夫兄弟执导的同名电影（1934）就是这样描写这场战争的。但在别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旗》杂志1996年第4-5期）中，不仅内战，甚至关于内战的这种文学，即变成了再叙述的题材：但恰巴耶夫也不再是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红军指挥员、富尔曼诺夫笔下传奇式英雄，而是另类人物，如他的战前动员令如此干涩，“小伙子们！你们聚集在这里干啥，你们知道。没什么好磨蹭的。你们会遇到各种情况，经受各种考验。不这样行吗？到了前线，要给那帮狗娘养的颜色瞧瞧。想什么呢——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玩啊……前方没有后方不行，后方没有前方也不

行……我们应该向前线去——这就是我向你们说的，别忘了，我这个指挥员会给你们撑腰的”。作为军事指挥员如此拙嘴，作为一个人却是诡辩论者：有一次拿起两个葱头，一个红皮剥光了只剩下白色葱肉，另一个紫红色的厚皮还留着，向“我”论述到，同一个葱头可以被脱去红皮显出白的肉体，但人不会这样从红的变成白的：

“难道我们意识到红的和白的，我们就能获得相应的颜色吗？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能获得这类颜色呢？”

“您可真能兜圈子。直说吧，不是红，也不是白，那我们究竟是谁？”

“你，彼得卡，在讨论复杂问题之前，先要搞清简单问题。要知道，‘我们’比‘我’更复杂”。

“是的”，我说道

“你把什么称作‘我’？”

“显然是自己”。

“能告诉我你是谁？”

“彼得·普斯托塔(虚空)”

“这是你的名字。而用这个名字的是谁呢 (А кто тот, кто это имя носит)？”

“嗯”我说道，“可以说，我是一个心理个性。是种种习惯、经验……知识、趣味之总和。”

“这是谁的习惯，彼得卡”恰巴耶夫急切地问道。

“我的”，我耸耸肩。

“可是你刚才说过，彼得卡，你就是诸多习惯的总和。既然这些习惯是你的，那就意味着，这是习惯总和的习惯 (Раз эти привычки твои, то выходит, что это привычки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привычек)？”

“听起来很可笑”，我说道，“可实际上正如此”。

“而习惯又会有怎样的习惯呢 (А какие привычки бывают у привычек)？”

我很生气了。

“我们这整个谈话很肤浅。殊不知，我们起初讲的是，就其本质而言我是谁。若方便的话，我认自己是……嗯，譬如说，是单子。这是莱布尼茨的术语”。

“而那位当初认为自己是单子的人又是谁呢 (А кто тогда тот, кто полагает себя этой мандой)？”

“还是单子”，我一边坚定地控制住自己一边回答道。

“好吧”，恰巴耶夫狡猾地眯缝着眼说道，“关于‘谁’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而眼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探究‘哪里’。告诉我，这个单子活在哪儿？”

“在我的意识里”。

“而你的意识在哪儿？”

“就在这儿”我拍着自己的脑袋说道。

“而你的脑袋在哪儿？”

“在肩上。”

“而肩膀在哪里？”

“在房间里。”

“而房间在哪儿呢？”

“在屋子里。”

“而屋子呢？”

“在俄罗斯。”

“而俄罗斯在哪儿呢？”

“在不幸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你抛开这个”他生气地斥责道，“开玩笑，要得到上司的许可才行。说吧 (Шутить

будешь, когда командир прикажет. Говори.)”

“还会在哪儿呢？在地球上呗。”

我们碰了杯，一饮而进。

“而地球在哪儿？”

“在宇宙中。”

“而宇宙在哪里？”

我沉思了一会儿。

“就在自身。”

“而这个就在自身在哪儿？”

“在我的意识里。”

“这样说来，彼得卡，结论是你的意识就在你的意识里 (твое сознание - в твоём сознании)。”

“结论是这样。”

“这样子呀”，恰巴耶夫小胡子说道，“当下你要仔细听我说。你的意识在什么地方？”

“我不明白，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地方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意识范畴，因而……”

“这个地方在哪儿？地方概念位于什么地方 (В каком месте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нятие места)？”

… …

(争论之后，我睡了一觉，醒来后，恰巴耶夫把我拉起来散步，我望了天空，说了一句“真美”)他摇摇头，若有所思地反问道，“美是什么？”

“怎么能这样问呢？美就是意志在其可认识性上最高层次的完美体现 (Красота-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ейшая объективация воли на высшей ступени ее познаваемости)”

… …他说，“一向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星空在脚底下，而伊曼纽尔·康德则在我们心中”。

“瓦西里·伊瓦诺维奇，我根本不能理解，怎么可以把一个师交给一个把康德和叔本华混为一谈的人指挥呢？”

到最后，“‘我’发现对这个人一点也不了解。‘告诉我，恰巴耶夫，您到底是谁？’。‘你，彼得卡，请你先回答你自己究竟是谁吧。然后，关于我也就清楚了。否则，你成天只会说我、我、我，就像你梦中的强盗。可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是谁？’”，这个恰巴耶夫完全不再是苏俄人所熟悉的英雄。这种不是经由学术考证、规避历史事件的叙述，渗入许多佛教描写，却有效唤起影响人性存在的心理革命，对俄国历史的描写，被尊重其历史或文化认同的人所冒犯。

可以说，198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文学，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批评、否定、反对、贬斥成为主流，正如久尔克福斯基 (Margaret Ziolkowski) 的《斯大林主义的文学伏魔：俄国作家和苏联的过去》(1998) 所总结的，后苏联文学是整个后苏联社会情绪化排斥苏联的感性表达，并且排斥集中到斯大林主义问题上来，虽然并未搞清楚斯大林主义乃俄罗斯帝国问题的表达。可是，这种持续十年之久的对苏联的否定性描写，无助于后苏联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加剧后苏联重建的紧张，并意识到长期负面评价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历史，实际上已经和批评本身的正面意义越来越远，以至于“1990年代以来，悔恨过去成为俄国的一种奖赏。十年来一致拒绝斯大林暴君是越来越不真诚了。否定的浪潮已经转向，并且有足够多的人为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终结而遗憾”。(Catherine Merridal 2000: 8) 因为苏联问题不仅仅是俄罗斯帝国的苏联时期的问题，而是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俄国学习西方，目的不是要把自己变成现代欧洲文明的民族国家，而是经由学西方的途径而强盛俄罗斯帝国，使欧亚大陆许多被强制性地成为俄国居民的其他族裔人口，经由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承认各种假定的宏大话语，包括1920年代末以来所设计出来的苏联共产主义——对外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对内牺牲非俄罗斯族裔的诉求。这种不以建立民族认同

为基础的帝国行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1960-80年代农村题材的兴起就是基于此，但终究因其对俄国民众伤害过于严重，成为其解体的最基本原因；并且，某种程度上还在俄联邦延续，普京对此批评道，“这个国家在一党垄断权力之下存续了70多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时光，许多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列宁名字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埋葬列宁就意味着他们曾为之献身的价值失败和那个目标的失败，他们曾经的生活是徒劳无益的”，并撤出了护卫列宁墓的守卫、恢复列宁墓附近的无名战士墓守护仪式。然而，苏联式的帝国意识始终植根于民众意识中，2005年普京的助手波尔塔夫琴科重提迁移列宁墓问题，仍旧引起社会公众舆论反弹程度（1990年代杜马选举俄共支持率为20-25%，到2003年仍维持12.6%），希望通过政治强势、历史手段去消除俄共影响力是很难的（普京趁势撇清和此事无关）。由此，历史文学无法再持续否定苏联的潮流——否则，文化产业难以为继，这正是卢卡奇在《历史小说》（1937）中所说的，历史小说应“创造过去的生活”，应“使过去接近我们，并使我们能在其真正现实中体验它”。此后，历史文学面临着如何满足于人们面对苏联的复杂情绪、如何重新叙述俄国历史事件和人物之转型。

### 参考文献

- [1] 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 1993 Несбывшеес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истории в зеркале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Новый мир, №4.
- [2] Биргит Мензел, Переломные периоды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 [3] Виктор Лупан, Профиль Сталина //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 Января 2010.
- [4] Дададь Н., Рудая З. 1996 Время ювлечения историей // Звезда, №5.
- [5] Игорь Зотов 1995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льбер Камю и кризис воображения // Огонёк, № 29.
- [6] Margaret Ziolkowski 1998 Literary Exorcisms of Stalinism: Russian Writers and the Soviet Past. Columbia.
- [7] Мелихов А. 1995 Плюрализм, по в меру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9 Марта.
- [8] Павел Пасинский, Из жизн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кактусов // ЛГ, 29 мая 1996.
- [9] Роднянская Ирина 1993 Гипсовый ветер. О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нтоксикации в текуще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Новый мир, 1993, №12.
- [10] Роднянская Ирина 1993 Сор из избы. Вокруг романа В. Шарова «До и во время» // Новый мир, 1993, №5.
- [11] Шаров В. 1996 Есть образ мира, который я хочу записать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8.
- [12] Catherine Merridale 2000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 London: Granta.
- [13] David Nrandenberger 2002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4] David Cannadine (ed.) 2002 What is History Now? Basingstoke & NY: Palgrave Macmillan.
- [15] Rosalinda Marsh 2000 Images of Dictatorship: Stalin i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amela Davidson (ed.), Russian Literature and its Demons. NY. & Oxford: Berghahn.
- [16] Victor Erofeev 2004 Life with an Idiot (trans. Andrw Reynolds). London.



# Russi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Soviet Union was Negatively Narrated

LIN Jing-hua

(Literature Colleg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ost-soviet era came along with the animadverting and negation of Soviet system. The trend was both the outcome of Soviet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imary impetus of post Soviet literature, resulting in a multitude of literary works on Soviet history including memoir, biography and novel of Soviet history. Rarely seen throughout the Russian literary histo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negated the Sovie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from various aspects. Authors of such works were mainly the witnesses of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The process was replaced by nostalgia for Soviet in the end of 1990s.

**Key words:** Post-Soviet; historical literature; negating Soviet

收稿日期: 2010-03-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叙述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01BJBWY01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精华 (1965-), 安徽黄山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苏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苏联文化转型问题。

[责任编辑: 刘 锟]